

汉译经典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季广茂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季广茂 译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 (斯洛文) 齐泽克著; 季广茂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ISBN 978-7-5447-5005-9

I. ①欢… II. ①齐… ②季… III. ①齐泽克, S. — 哲学思想
IV. ①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8549号

书 名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作 者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季广茂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何 婷
原文出版 Verso,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6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05-9
定 价 4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文版前言

依黑格尔之见，重复（repetition）在历史上发挥着明确的作用。某件事情第一次发生时，人们会视之为事出偶然。人们会认为，如果当初处理得当，这件事情大可避免发生。但是，一旦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具有深层的历史必然性。1813年拿破仑第一次溃不成军时，大家觉得他只是运气欠佳；他再次在滑铁卢一败涂地后，大家都知道，他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今日正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吗？2008年9月它第一次冲击市场时，人们觉得，这只是偶然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管理加以矫治；现在，金融崩盘的迹象日益明显，人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

且让我们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时，希特勒推动排犹主义，把排犹主义当成叙事性解释，以之解说普通德国人经历的种种烦恼，包括失业、道德堕落、社会动荡等。一句话，所有这些烦恼都是由犹太人一手造成的。虚构一套“犹太阴谋”，提供一个简易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仿佛如此一来，就能使一切一目了然。今天西方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仇恨，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不正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吗？怪异的事情不断发生，影响我们日常

生活的金融危机正在形成，而西方人对这些灾祸的体验却是不明所以和不辨西东。这时，拒绝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条捷径。他们可以说，扰乱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正是那些来自外部的人侵者……因此，在西方国家正在兴起反移民的浪潮——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大开杀戒即其顶峰——与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①仿佛只要坚守自己的族裔身份，就能抵挡下列创伤性的事实——他们已经身陷无法明了的金融失血这一旋涡之中。但归根结底，那个无法同化的“外来物”就是资本这个恶贯满盈、自我驱动的机器。

布雷维克曾对自己的杀人行为做出回应，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布雷维克的意识形态性自我辩白（ideological self-justification）来思考某些事情。布雷维克这位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猎手”在奥斯陆杀害了七十多人，他的宣言绝非一个疯子的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而是对“欧洲危机”所做的逻辑严密的解说。可以（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宣言视为正在崛起的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的隐含根基。它的前后不一昭示了这种观点的内在矛盾。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布雷维克是如何建构他的敌人的：他把三种元素（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融为一体，而这三种元素又分属于不同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激进左翼、多元文化主义

① 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1979—），挪威恐怖分子。2011年7月22日，他先在奥斯陆制造了爆炸案，导致8人死亡，30人受伤；后赴奥斯陆附近的于特岛（Utøya），对那里的青少年学生展开疯狂屠杀，导致68人死亡，66人受伤。其后有伤重者去世，遇害人数共计77人。行凶前曾将事前拟定的“宣言”以电邮的形式寄给1003个接收者。——译者注

的自由主义和伊斯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有个老习惯，即把相互排斥的不同特性(“布尔什维克—财阀的犹太人阴谋”——布尔什维克激进左翼、种族—宗教的身份)归诸敌人。现在，这个习惯借尸还魂了。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布雷维克的自命不凡彻底改变了激进右翼的意识形态。布雷维克鼓吹基督教，却是个世俗的不可知论者：对他而言，基督教只是用来反对伊斯兰教的文化建构。他反对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不应接受高等教育，但又赞成“世俗”社会，支持堕胎，自称支持同性恋。此外，布雷维克把纳粹特征(同样甚为具体，如喜爱中世纪北欧传说，与瑞士亲纳粹的民歌手心心相印)与仇视希特勒结合起来：他崇拜的一个英雄是挪威反纳粹抵抗运动领导人马克斯·马努斯(Max Manus)。布雷维克反对穆斯林胜过他支持种族主义：他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穆斯林造成的威胁上。最后，布雷维克排犹，却亲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他甚至希望看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他的看法是：犹太人只要不遍地开花，就没有问题。正如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所言：“西欧并不存在犹太人问题(英国和法国例外)，因为只有一百万犹太人生活在西欧。一百万犹太人，有八十万生活在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美国拥有六百万犹太人(是欧洲的六倍)。美国有着相当严重的犹太人问题。”他的这串数字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纳粹分子(Zionist Nazi)的终极悖论：这是如何可能的？

欧洲右翼对布雷维克的攻击做出了回应，该回应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一点。它的经典做法是，在谴责布雷维克的杀人行为时，

强调不应忘记，布雷维克已经提出“对真正问题的合理关切”。主流政治未能应对伊斯兰教化与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的侵蚀。或者，引用《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 上的话说，我们应该把奥斯陆悲剧“当成严肃重估挪威等地的移民融合政策的机遇”。顺便说一句，如果听到有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做类似的赞赏，那该多好。比如，有人说，“应该把这些恐怖行为当成重估以色列政治的机会”。当然，这样的评价自然隐含着对以色列的指涉：“多元文化”在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机会，种族隔离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要为签订这个纯然变态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主义协定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证明占有巴勒斯坦是完全合理的，不得不回溯性地认可欧洲初期用以反对犹太人的论证路线。秘而不宣的交易是：“如果你们承认我们有权不去宽容巴勒斯坦人，那我们就准备认可你们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这个秘而不宣的交易的悲剧性反讽在于，在上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是第一批“多元文化主义者”：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另一种文化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文化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附带说一句，我们应该注意，在 1930 年代，在对纳粹的排犹主义做出直接回应时，欧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 这位对精神分析进行绅士化 (gentrification) 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陷入了怪异的沉思：一个国家要容忍占多大比例的外来人口才不至于将自己的身份置于危险的境地。最后他接受了纳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道路的尽头，是一种决不可小觑的极端可能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完全有可能达成“历史性的协定”。

但是，如果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新世纪呢，在那里，这种新的推理即将发扬光大？英国 2011 年 8 月发生的骚乱暗示了这个走向。尽管骚乱是由马克·杜根（Mark Duggan）的可疑死因引发的，但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骚乱表达了更深层的惴惴不安。这是什么性质的不安？与巴黎市郊 2005 年的焚车事件类似，英国的抗议者没有任何信息要传达。它与 2010 年 11 月爆发的学生抗议（后来变得血腥残暴）形成了对比，因为那次学生抗议有要传达的信息，即拒绝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很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在涌现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来设想英国的骚乱，原因就在这里。黑格尔的“乌合之众”（rabble）更适宜于这些骚乱的分析。“乌合之众”指那些处于有机社会空间（organized social space）之外，被阻止参与社会生产的人。他们只能假借破坏性暴力的“非理性”爆发，假借黑格尔所谓的“抽象否定性”（abstract negativity），来表达自己的积怨。或许，这就是黑格尔的秘而不宣的真面目，黑格尔政治思想秘而不宣的真面目：一个社会越是井然有序和神智健全，“非理性”暴力这个抽象否定性就越是要归来。

有个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工人，守卫疑其偷窃。每天晚上他离开工厂时，都会若无其事地推辆独轮手推车，守卫对这辆车再检查，结果毫无发现。手推车总是空空如也。后来守卫终于恍然大悟：那个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车。守卫检查手推车时，只关注内容，忽略了形式，这与分析家在考察骚乱的隐含意义时的做派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1990 年发生的事件——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信号。曾经导致了

极权主义灾难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不过，如果那个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我们正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迸发中，而且这种意义是清晰可辨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我们看到的抗议是零度抗议，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看到社会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家试图理解和帮助那些抗议者，就会领略其中的反讽意味。这些人不顾一切地把抗议行为转换为他们理解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骚乱提供的关键之谜。

尽管抗议者们实际上社会地位低下，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绝对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没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捉襟见肘，在生理及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受尽压迫，但他们一直都能自我组织，并把自己转换成具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纲领。我们必须对此事实做出阐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政治的困境之中：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它自诩为“选择的社会”（society of choice），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达成民主共识方面，唯一的选择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动（acting 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义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个事实是对我们困境的严厉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那脍炙人口的“选择自由”又何用之有？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日甚一日地体验为“无世界”(worldless) 的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空间内, 抗议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形式, 就是无意义的暴力。无论纳粹的排犹主义有多么恐怖, 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 它设置了一个敌人, 即“犹太阴谋”, 并以此描述它面临的危急情形; 它制定了目标, 并指出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纳粹主义是这样揭示现实的: 它允许其臣民获得全球性的认知图绘, 包括供其积极介入的空间。或许我们应该在此锁定资本主义的一大危险所处的方位: 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 也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它支撑的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 并使多数人丧失了有意义的认知图绘。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detotalizes meaning) 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意义的层面上, 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 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 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 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的文明形态, 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 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 without meaning) 这个层面上, 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the global market mechanism)。

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动荡局势的应对之所以失败, 原因就在这里。保守派的应对, 我们一猜便知: 这样的恶意破坏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 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秩序; 想进一步阻止此类骚乱的发生, 需要做的不是宽容和社会救助, 而是奉公守法、艰苦劳作和责任感, 等等。这类解说的虚假之处, 不仅在于它忽略了一

个事实——正是令人绝望的社会情形驱使年轻人走向了暴力，而且在于（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暴力以这种方式喷发，是对保守意识形态的秘密前提的应答。保守派在1990年代发动臭名昭著的“回复本原”^①运动时，它淫荡的补充物显然是由诺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的“永远不要羞于暴露保守派无意识中的肮脏秘密”暗示出来的：“人不仅是群居动物，还是领土动物（territorial animal），必须把满足部落制（tribalism）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基本本能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才是“回复本原”的言内之意：重新张扬潜藏于高尚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伪装之下的野蛮的“基本本能”。难道我们没有在充满暴力的抗议中遭遇同样的“基本本能”？不是卑躬屈膝的下九流阶层的“基本本能”，而是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本能”？1960年代，为了解释当时流行的“性革命”——消除阻止自由性行为的传统障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引入了“压制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一语：人的驱力是可以“去崇高化”的，是可以剥离其高尚的外壳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保持其“压制性”的品格。我们如今在英国大街上看到的，不正是这种“压制性的去崇高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沦为“天然野兽”的人，而是历史上特定的、由霸权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天然野兽”，即处于零层面（zero level）的资本主义主体。

因此，思考下列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面对骚乱，保守派和自

^① “回复本原”（back to basics）指英国保守党提出的回复到理想生活的基本原则的主张。——译者注

由派都做出了回应，相形之下，哪个回应更为糟糕？斯大林会说，它们全都糟糕透顶。关于这些暴力行为的真正危险之处，两方均提出了警告，两方的警告同样糟糕透顶。这些警告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对骚乱做出的种族主义回应之中。预测这种回应，可谓易如反掌。绝对不应该给这种回应贴上“反动”的标签，将其一脚踢开。这种回应早已在自身“部落”活动的遮掩下发生：突然出现了区域群落（土耳其人、加勒比人、锡克教徒等）自己组织的自我防卫，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组织了民间警戒单位（vigilante units），保卫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产。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同样应该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小店主是在保卫小资产阶级，反抗对体制的抗议（地地道道却又充满暴力的抗议）？或者，那些保卫者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反抗促使社会解体的力量？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几乎是专门以这些人为目标的。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并不属于更富裕的街区：它们是某个阶层来之不易的财产的一部分，而抗议者就来自这个阶层。真正展示了这种形势的悲惨真相的是，这场冲突发生在处于两个极点的下层社会之间：一个极点在这个体制内成功地运作着，一个极点因为心灰意懒而难以为继，现在能够一展身手的，就是对自己群落的另一个极点发起攻击。因此，使骚乱得以进行下去的冲突，并非只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在最激进的层面上，冲突发生在非社会与社会之间（conflict between non-society and society），发生在将毫发无损的人和将丧失一切的人之间，发生在不承担丝毫群落风险的人与承担最高群落风险的人之间。

但是，为什么抗议者会实施这种类型的暴力？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把这些骚乱描述为“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行为时，已经跻身于右翼之列。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骚乱是消费主义的破坏行为大狂欢，是借助暴力展示出来的消费主义欲望。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所以通过暴力来展示，是因为无法以“正常”方式（购物）做到这一点。如此说来，骚乱也包含着如假包换的抗议的时刻，那就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讽性回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被这种意识形态狂轰滥炸：“你号召我们消费，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以正常方式消费的可能性，那好吧，我们只能以我们仅有的方式消费！”因此，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以痛彻肌肤的方式展示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骚乱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暴力性，而在于下列事实：这种暴力并非真的自我张扬，用尼采的话说，这种暴力是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它是软弱无力的愤怒和绝望，却拉着无往不胜的架势。它是嫉妒，却装扮成了扬扬得意的狂欢。

危险在于，宗教必定会填补这个空白，并恢复意义。也就是说，要把骚乱置于这样的一系列事件之内：这些骚乱会与另一种类型的暴力结合起来，而多数自由主义者如今把这种类型的暴力视为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即直接的恐怖袭击和自杀爆炸。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杀爆炸，暴力和反暴力都会陷入致命的恶性循环，每一种都催生它试图与之作战的武力。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自杀爆炸，我们都要面对盲目的“付诸行动”（passage act），而暴力意味着对自身软弱无力的默认。不同之处在于，与巴黎或英国爆发

的“零层面”抗议形成对比的是，暴力虽然发生了，却不希望得到什么，恐怖袭击的发生却代表着由宗教赋予的绝对意义。

齐泽克

2012 / 02 / 25

引论：红墨水缺货

在先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流传着一个老笑话。它说的是，一个德国劳工在西伯利亚觅得一份工作。他知道，从那里写信回国，必定无法绕过审查官的法眼，于是与朋友约定：“我们建立一套密码：如果我写给你的信是用普通蓝墨水写的，那我信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就是假的。”一个月后，朋友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奇妙无比：商品琳琅满目，食品极其丰富，公寓不仅宽敞，暖气也很充足，电影院里放映的全是西方大片，还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与她们眉来眼去。只有一样不好——红墨水缺货。”笑话的结构比初看上去要精致得多：尽管无法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告诉朋友他信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他还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把先前提到的密码的事情编入了加密信息自身，使先前提到的密码成了加密信息的一个因素。当然，这是标准的自我指涉问题（problem of self-reference）：虽然来信是用蓝墨水写的，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真的吗？答案是，信里提到了红墨水缺货，这等于告诉收信人，这封信本来是要用红墨水写的。这个笑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提到了红墨水缺货，具有了揭穿真

相的功效 (effect of truth)，而这样的功效是不依赖于它的字面之真 (literal truth) 的：即使买得到红墨水，也可以谎称买不到；在这种特殊的审查制度下，这是传达真实信息的唯一有效方式。

这岂不为切实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样本？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指“极权主义”审查体制下的意识形态，而且或许更应包括更为优雅的自由主义审查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开始时我们都会同意，我们拥有自己渴望拥有的全部自由，然后再加一句：就是没有“红墨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缺乏那种语言，无法用它表达我们的不自由。没有红墨水，这意味着，今天我们用来命名眼前冲突的术语，包括“反恐战争”、“民主和自由”和“人权”等都是假的，都模糊了我们对形势的感知，而不是让我们对之慎思明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享有“自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之掩饰和维系我们更深的不自由。一百年前，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指出，接受僵化的教条是（要求获取）现实自由的前提。^①他说这话时，显然敏感地觉察到，在思想自由 (freedom of thought) 这一原则下面，隐藏着反民主的潜能 (antidemocratic potential)：

我们可以泛泛地说，自由思想 (free thought) 是用来抵抗现实自由 (freedom) 的最佳保障。设法以现代方式解放奴隶的

①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生于伦敦小康之家，曾创作推理小说，著名的“布朗神父”即出自他的笔下。——译者注

心灵，是阻止解放奴隶的最佳方式。只要启发奴隶在“究竟要不要获得自由”这一问题上忧心忡忡，他就永远不会使自己获得自由。^①

这话岂不特别适用于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破坏、怀疑和疏远自己的自由。我们不应该忘记，切斯特顿在此提出的主张与康德在《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康德说：“你喜欢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你喜欢怎么自由地思考就怎么自由地思考，但要服从！”如果说两人有何不同，这不同就表现在，切斯特顿说得更具体，点出了康德的推论下面隐藏的悖论：思想自由不仅不会动摇现存的奴隶制度半根毫毛，还会为这种制度添砖加瓦。“不要思考，服从！”康德反对这句古老的格言，因为这句格言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它有力地促生了反抗。只有通过思想自由，才能维护奴隶制度。切斯特顿赞成上述格言的对立面：对自由的争取，离不开对某种无可置疑的教条的接受。他这样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好莱坞的神经喜剧^②常有经典的对白。比如一位女孩问她的男友：“你想不想娶我？”“不想！”“不要躲躲闪闪了！爽快回答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对话遵循的逻辑是正确的：对于这个女孩来说，

① 原注 1.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Orthodoxy*,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5, p.114.

② 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一种颇具美国特色的喜剧，通常利用身份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制造冲突，在求偶和婚配的过程中制造笑料，最后却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对话机智，语速快，喜剧效果明显。起源于 1930 年代，1940 年代最为兴盛。——译者注